

主编：张传玺

张传玺，山东人，1927年生。北京大学历史系副博士，师从翦伯赞，研究秦汉史。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讲教师、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、中国北京史研究会顾问、国家教委（教育部）中学历史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等。主要研究秦汉史、中国古代经济史、历史地理等。主要著作有《秦汉问题研究》、《中国古代史纲》、《简明中国古代史》、《翦伯赞传》等。



作者：吴宗国



吴宗国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。1934年生于南京市，祖籍江苏如皋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，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。

目录	
摘要.....	3
第一章：成长背景.....	5
第二章：从秦王到太子.....	10
浅水原之战.....	12
柏壁与介休之战.....	13
虎牢大会战.....	14
洛水之战.....	16
玄武门之变.....	17
第三章：明君贤臣良将.....	18
兼听纳谏.....	22
贤臣.....	24
良将.....	26
第四章：贞观之治.....	28
君臣论治.....	29
劝农务本.....	31
提倡学术.....	34
以法为准.....	38
第五章：天可汗的功业.....	39
经略四方.....	41
府兵制.....	44
第六章：治世风貌.....	45
开放的社会文化.....	47
物阜民丰.....	48
外来的宗教信仰.....	49
第七章：功过评价.....	50
参考资料.....	53
鸣谢.....	54

摘要

唐朝（公元 618—907 年）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。中国人至今在海外被称为唐人，据说与强盛的唐朝有关。唐初皇帝李世民为唐代的兴盛，作出杰出的贡献。

唐朝是由当时中国西部贵族李渊创建的。李渊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的贵族。李渊家族与前朝隋皇室有亲戚关系。李渊原是隋朝皇帝信任的将领，受命在山西负责镇压人民起义。李渊见隋朝大势已去，遂在山西太原起义，推翻隋朝，在公元 618 年建立唐朝。李渊有四子，长子李建成，次子李世民，三子李元霸早逝，四子李元吉，皆英勇善战。李世民十六岁就追随父亲开始军旅生涯，因参与太原起兵有功，在建立唐朝后被封为秦王。

李世民出生于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（公元 599 年 1 月 23 日）。十九岁的李世民成为秦王以后，继续征战四方，为唐初全国的重新统一立下了卓越战功，声望不断提高。唐高祖李渊已确定长子李建成为皇位继承人，但李世民的目的是夺取皇位的继承权。

公元 626 年六月初四日，李世民在皇宫北门玄武门埋下伏兵，亲手射杀大哥李建成，四弟李元吉也被他的亲信杀死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场宫廷政变，史称“玄武门事变”。事变之后，李渊被迫退位，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，即唐太宗。

唐太宗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继西汉盛世之后又一个盛世。因为唐太宗年号叫贞观，所以史学家把这个盛世称为“贞观之治”。

唐太宗是历史上善于起用人才的帝王之一。他任用的宰相魏征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，敢于当面不留情面向他提不同意见，唐太宗有时也难免动怒，但始终包容他。魏征死后，他说：“人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魏征殁。朕失一镜矣！”这段话在历史上很出名，常被后世引用。

唐太宗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生产，减轻徭役，与民休息，很快创造出强盛王朝的经济基础。

中国的科举考试在隋代初步确立，到唐代步入正轨。唐太宗重视科举考试，对录取的进士名单都要认真审核。科举考试开创了读书人从平民上升到统治阶层的通道，是对魏晋以来豪族子弟霸占政坛的“门阀制度”有力的抗衡。

唐太宗时期，中国文化也很兴盛。当时书法家创立工整的楷书，至今仍是学习中国书法的范本。唐代的诗歌至今仍不断入选中小学课文。唐代的雕塑、绘画对后代影响也很大。

唐太宗对西域征战，交通通道初步打开，丝绸之路重新恢复。他还让皇室女儿文成公主入藏，与吐蕃国王松赞干布成亲，从此，吐蕃与唐朝建立起亲密的关系。

玄奘西行是唐太宗时期中外交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。玄奘经中国新疆、中亚，到达巴基斯坦和印度，在巴基斯坦、印度、尼泊尔游学，并带回佛经，在长安翻译，玄奘翻译的佛经至今仍在佛教徒中广泛使用。

唐太宗晚年评价自己在武功、文治和怀远三个方面大大超过古人。史学家则批评他晚年骄傲自满，听不进属下的意见。有史学家批评他晚年过于追求个人享受与贪欲，但总体来说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。

第一章：成长背景

唐太宗李世民出生在一个关陇贵族高门的家庭，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是鲜卑贵族，和北周、隋的皇室有着亲戚关系。李世民虽然生于隋朝开皇盛世，但在他的少年成长时期，却碰上隋末乱世的年代。正是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，给予少年李世民一个不平凡的经历。



隋文帝像

显赫的先世

李世民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（公元 599 年 1 月 23 日）生于咸阳武功，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。他的曾祖父李虎是西魏八大柱国之一，北周初追封唐国公。祖父李昺是北周安州总管、柱国大将军。李世民的祖母独孤氏，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女儿，亦为西魏八柱国之一，与北周明帝的皇后及隋文帝的皇后是亲姐妹。

父亲李渊，幼年丧父，七岁袭封唐国公，十五岁时被任命为隋文帝的贴身侍卫官千牛备身。李渊在姨母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关照下，很快出任刺史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。李世民的母亲窦氏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外甥女。李世民就是出生在这样

一个显赫的关陇贵族家庭。他的妻子长孙氏是鲜卑贵族、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。

少年李世民

隋炀帝大业十一年（公元 615 年），李渊受命为山西、河东抚慰大使，负责镇压山西一带的人民起义军。十六岁的李世民也跟着父亲到了太原。这一年恰好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包围，遂令各地募兵前来救援，李世民应募从军，参加了救援隋炀帝的战役。第二年，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。为防御突厥，李渊从所部五千人中，选善能骑射者二千人组成骑兵，饮食居止，驰骋射猎，都与突厥人一样，以增强战斗力。

甄翟儿率领起义军二万余人进入西河郡（今山西汾阳），逼近太原。李渊统步骑五六千人南下镇压，相遇于雀鼠谷口。李渊率领轻骑数百突袭，取得胜利。李世民也参加了这次战役。这段戎马生活，使他受到初步的军事锻炼，对他后来南征北战，削平群雄，统一全国，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。李世民亦趁机在太原结交各方人物，《旧唐书》说他：“每折节下士，推财养客，群盗大侠，莫不愿效死力。”



唐高祖李渊画像

关陇集团

公元 534 年，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。原来北魏北方六个镇的将领进入关中后，宇文泰成为他们的首领。宇文泰以毒酒杀害进入关中的北魏孝武帝，另立文帝，自己掌握了政权，史称西魏。

关陇和河东等地豪强地主的力量，在当时有很大的发展，在东、西魏的争夺战中，这些豪强地主都归附了宇文泰。为了把北方六镇武将和关陇豪族的力量统一起来，宇文泰组成了以八柱国为核心，以大将军、开府为主要成员，以府兵系统为基础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，一般就称之为关陇集团。这是一个依靠武装力量建立起来、胡汉结合的集团。在西魏、北周、隋和唐初他们都占据着统治地位。

北周、隋和唐的皇帝都出自这个集团。不同的是，在西魏和北周，鲜卑贵族占据主导地位，而自隋开始，关陇贵族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汉族贵族。隋文帝杨坚、唐高祖李渊都出身于关陇贵族家庭，他们的母系都有鲜卑血统，但他们的父系都是汉族。



北魏彩绘陶文武士俑

胡汉融合

西晋末年，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民族进占华北地区，先后建立了十几个胡族国家，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五胡十六国时期。公元 439 年，北魏统一了北方，结束了北方的长期战乱。进入北方的这些胡族，和汉族共同生活，接受汉族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。他们还与汉族通婚，使用汉族的语言文字。北魏孝文帝推行汉

化政策，大大推动了北方各民族的融合。各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也为汉族所接收，特别是饮食、服饰等方面。在民族融合基础上所形成的各种风俗习惯，直到唐朝仍然保留在社会生活中。唐朝的服装，特别是妇女的服饰很有特点，就是因为吸收了各民族服饰的特点。正因为如此，后来有人说唐人大有胡人之气。



西安出土的各种胡人俑

隋末天下大势

隋文帝开皇后期到隋炀帝大业初年，是隋朝的鼎盛时期。国家统一，兵力强盛。国家的粮仓堆满粮食，洛阳附近的洛口仓，所储米粟多达二千余万石。长安、洛阳和太原库房里的绢帛，各有数千万匹。可是好景不长，隋炀帝即位后滥用民力，在公元 604 年至 610 年短短几年间，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，修缮离宫，开凿运河，兴建了许多浩大工程。他还经常远出巡游，南至扬州，北至榆林（今内蒙准噶尔旗东北），西至张掖，每次都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。又连年征战，特别是对高丽的战争，更是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。

几百万壮丁在繁重的徭役劳动和战争中死亡，连妇女也被征去服徭役。农村里只剩下老弱和儿童。无法生产，耕稼失时，土地因而大量荒废，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。农民不能忍受这样残暴的统治。炀帝大业七年（公元 611 年），王薄在山东章丘长白山率众起义，揭开了隋末民变的序幕。原已臣属隋朝的东突厥，也不断南下骚扰。



扬州隋炀帝墓

第二章：从秦王到太子

晋阳起兵

大业十二年（公元 616 年），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。隋炀帝虽然交给李渊守卫太原的重任，但是对这位表兄弟，他并不信任。突厥进攻马邑，结果隋军失利。隋炀帝马上遣使执拿李渊和马邑太守王仁恭，并令送往当时隋炀帝所在的江都（即扬州）治罪。后因瓦岗军逼近东都洛阳，形势日益紧张，炀帝遂又遣使赦免李渊、王仁恭的败兵之罪，恢复旧任。这时候，隋王朝已经土崩瓦解，隋的军队分别被河北的窦建德、河南的瓦岗军和江淮的杜伏威军分割包围，沦为几个孤立的据点。

久蓄取代隋朝之心的李渊见时机成熟，积极准备起兵。李世民也担负联络地方豪杰，以及掌握招募新军队的工作。李渊又派晋阳令刘文静出使突厥，向始毕可汗称臣，取得突厥的支持，解除后顾之忧。接着，李渊抓紧隋军与瓦岗军相持于东都洛阳城下，无暇西顾的时机，于大业十三年（公元 617 年）五月从晋阳（即太原）起兵。李世民与长兄李建成分别率领左、右军，进军关中，直指隋的首都长安。

李世民在太原追随父亲李渊起兵后，东征西讨，辅助李渊建立唐朝。唐高祖李渊皇后窦氏共生了四个儿子，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，经常留在长安协助唐高祖处理政务。二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，经常带领军队东征西讨。三子李元霸，早逝。四子李元吉被封为齐王，也经常出征在外。



彩绘贴金铠甲骑士俑

唐太宗

当时全国正处于群雄割据的局面，李世民率领军队东征西讨，消灭了盘据各地的武装力量，为全国的重新统一立下了卓越的战功。随着威望提高，李世民与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开始争夺皇位，最后发动了“玄武门之变”，取代了李建成的太子地位。

军事才能

李世民在战争中学会了指挥作战。他善于分析敌我双方形势，注意双方的优势和缺点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作战计划。对于不同的敌人采用不同的战略。在指挥作战时，能果断掌握战争时机，集中主力攻击。他注重调查及研究，以掌握敌人的具体情况。在每次战斗前和战斗中，他都会亲自带领少数精骑，深入侦察敌方。他还善于集思广益，听取各方意见，发挥将领的作用。在作战过程中，李世民总是身先士卒，不怕疲劳，冒着生命危险亲自率领部队乘胜追击溃逃的敌人。

李世民善于运用骑兵去完成各项战争任务。他曾经说过：“吾自少经略四方，颇知用兵之要，每观敌阵，则知其强弱。常以吾弱当其强，强当其弱，彼乘吾弱，逐奔不过数十百步。吾乘其弱，必出其阵后反击之，无不溃败。所以取胜，多在此也。”在战争中，李世民锻炼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，成为一个智勇兼备的统帅。



唐太宗立像

浅水原之战

李世民在战争中，学会了如何调兵遣将、指挥军队。武德元年（公元618年）六月，盘据金城（今甘肃兰州）的薛举前来攻打泾州（今泾川），李世民率兵抵御。在浅水原，薛举乘唐军不备，暗中派兵从背后进攻唐军，唐军大败。当时与李世民一起率兵迎战的宰相刘文静因此被罢官。这次失败给李世民重大教训，不下于他在太原参加过的几次战役。

在第二次对薛举的儿子薛仁杲作战时，李世民采取了薛举从阵后进攻的战术。战场仍在浅水原，双方交战时，李世民一面派兵到浅水原南面布阵，摆出决战的架势。同时，率兵迂回地攻击敌军阵后，并亲率精骑突入敌阵，击溃薛军。他又率轻骑乘胜追击，进围薛仁杲所据之折城（在今甘肃泾川县东北），使敌人的溃兵不能入城坚守，薛仁杲被迫出降。在此后的战争中，李世民都注意到利用骑兵突入敌阵或突袭敌军阵后的战术，以出奇制胜。



昭陵文骏之六：白蹄鸟

柏壁与介休之战

武德二年（公元619年），在突厥支持下，刘武周从山西北部南下，围困并州（今太原西南），攻下涇州（山西翼城），至此，唐在黄河东岸就只剩下晋州西南的一隅之地，形势十分严峻。

同年十一月，正值隆冬，李世民率军踏冰渡过黄河，驻扎柏壁（今山西新绛西南），与驻屯涇州的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军主力相对峙。李世民采用主力军“坚壁不战”的方针，同时，分遣一部分兵力在汾州、隰州一带活动，牵制敌军进攻浩州（今山西汾阳）的力量。宋金刚的军队孤军深入，与唐军僵持五个月，士气逐渐下落。

第二年春夏之交，唐军切断了宋金刚的运粮线。宋金刚的军队被迫从涇州北撤。李世民率轻骑追击，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，在介休一带多次战斗。唐军士卒疲惫，有人建议休息，待军粮和后继部队齐集后再行决战。李世民说：“机会难得易失，宋金刚败退，军心已经涣散。我乘其未定，乘势追逐，此破竹之义也。如果迟留，贼必生计，将会失去时机。”于是指挥军队继续前进。史书记载，他自己更两天不吃饭，三天不解甲，终于击溃了宋金刚的军队，取得了对刘武周战争的决定性胜利。刘武周、宋金刚逃奔突厥。



昭陵文骏之三：特勤骠

虎牢大会战

李世民负责指挥的第三次大战争是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争，前后经历了十个月的时间。王世充原是隋的东都（今洛阳）守将，武德二年（公元 619 年）四月，他自立为帝，国号郑。次年七月，唐高祖命李世民率军东讨王世充。李世民率军驻屯北邙山，进逼洛阳。唐军顺利攻占了洛阳周边的许多据点，第二年开始对洛阳宫城展开猛烈进攻。王世充无力抵抗，便向窦建德请求援助。

在河北、山东地区，自称夏王的窦建德害怕王世充灭亡会威胁到自己。于武德四年（公元 621 年）三月，发兵十余万西上，迅速抵达成皋（今河南荥阳汜水）。面对两路敌人，李世民接受了郭孝恪和薛收等的意见，对王世充围而不攻，自己率领精兵三千多人赶赴成皋的险要虎牢关，以阻止窦建德西进。

李世民得到情报，窦建德准备在唐军马料用完，需到河北牧马的机会偷袭虎牢。五月初一，李世民北渡黄河，牧马于河北，只留下一千多匹马，伪装粮草已尽，以迷惑窦建德，自己则于晚上回到虎牢。

第二天一早，窦建德果然以全力出击，军队绵延二十里。两军在汜水两岸摆开阵势，相持到中午，窦军士卒饥饿疲倦，散坐在地上，互争饮水，军纪散乱。此时，放牧河北的马群已经调回，李世民下令出击，自己帅轻骑先进，大军随后，东渡汜水，直冲窦军阵后，窦军很快被击溃，窦建德被俘。洛阳的王世充看到大势已去，只得投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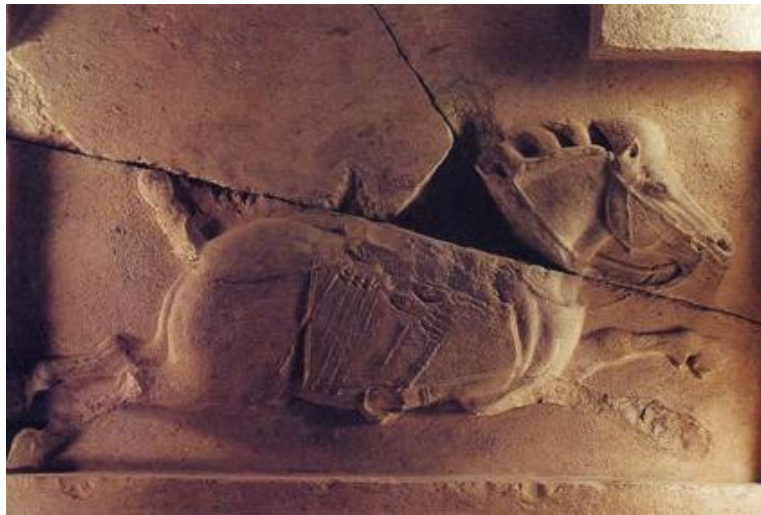
柏谷屯地形险要，王世充在此设州，派兵戍守，少林寺位于其东南面。武德四年（公元 621 年），秦王李世民兵围洛阳时，少林寺僧志操、惠场、昙宗等率众抗拒王世充，于四月二十七日“翻城归国”，为打败王世充立下了功勋。李世民特致书嘉奖，并召见立功首领。此事演化为后世演义小说“少林寺十八武僧救秦王”的故事。



河南少林寺塔林



昭陵六骏之一：青骊



昭陵六骏之二：什伐赤



昭陵六骏之四：飒露紫（复原模型）

洛水之战

打败窦建德，占领东都洛阳以后，李世民身披黄金甲，在铁骑万匹的护拥下，在军乐大吹大擂声中，凯旋回到长安。但李世民万万没想到，十天以后，窦建德的旧将刘黑闥在漳南复起，很快恢复了窦建德原来统治的地区。李世民再次奉命讨伐山东。面对拼死抗争的人民，曾经连续打了几次大胜仗的李世民也一筹莫展。

唐军与刘军相持达六十日之久，有一次李世民本人也被刘军包围，险些做了俘虏。最后，李世民采用事先在洛水上游筑堰，于决战时用决堰放水的办法，才把刘的军队打败。但李世民继续采用残酷的办法，惩治起义的人民，这为刘黑闥的再起埋下伏线。果然，半年后，刘黑闥利用人民的报复反抗心理，东山再起。这次奉命征讨的太子李建成，采用魏征的建议，实行政治瓦解的办法，释放全部被俘的刘黑闥军将士，对参加起兵的不予追究，以争取民心，最后才平息了河北、山东地区人民的反抗活动。



昭陵六骏之五：拳毛騧

玄武门之变

隋大业末年，李渊被诏讨贼于汾州、晋阳之间，留长子建成携家属居于河东。李建成因而较了解社会情况，史称他宽简、仁厚，有政治才能，并且有魏征和王珪这样杰出人物做幕僚。

李世民在削平群雄的战斗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勋，威望愈来愈高，势力与财富亦与日俱增。平窦建德、王世充以后，他继续搜罗人才，并拉拢地方武将，在地方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。凭借这些资本，他力图夺取皇位继承权。李世民的这些行动使李建成感到自己的太子地位受到严重威胁。李建成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，也设法扩大自己的力量。在魏征建议下，李建成主动向太祖李渊请求领兵平定再起的刘黑闥，借此建立战功之余，并与河北的将领和山东豪杰建立联系，以扩大自己的力量。四弟李元吉也站在李建成一边，兄弟之间都在积累力量。兄弟双方在首都长安扩大自己的卫队，互相收买对方的将领，并且在大臣和后宫中寻找支持自己的力量。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，不论是在首都长安还是在外地，李建成都略占上风。兄弟间的争斗已发展到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的地步，终至酿成骨肉相残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武德九年（公元 626 年）六月初四，李世民在妻弟长孙无忌、谋臣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帮助下，对太子发动了突如其来的袭击。在皇宫北门玄武门，李世民事先埋下伏兵，乘李建成入朝没有防备，亲自射杀李建成，齐王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杀死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玄武门之变”。不久，唐高祖李渊被迫退位，李世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，是为唐太宗。



唐长安城大明宫复原图

第三章：明君贤臣良将

唐太宗是一位英明的皇帝，也是一位开明的君主。他认识到“非贤不理”，“用非其材，必难致治”，必须广任贤良，才能实现治世的道理，他还认识到必须广泛听取各种意见，不偏听偏信，才能成为一个明君。因此他十分愿意听取臣下的意见，并以勇于纳谏而在历史上闻名。他选用了一批贤臣良将，帮助他成就了贞观伟业。

广任贤良

在贞观元年（公元 627 年），大臣王珪对太宗说：“非贤不理，唯在得人。”太宗回答说：“朕思贤之情，岂舍梦寐。”表示自己连做梦也在想着贤才，言下之意是自己正在为找不到贤才而苦恼。大臣杜正伦当即指出：“世必有才，随时所用。”唐太宗听后深受启发，要群臣举贤。

宰相封德彝久久不举，并且以没有发现奇才异能为自己辩解。唐太宗驳斥道：前代明王“皆取士于当时，不借才于异代。”指出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向其他时代借人才的道理，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它所需要的人才，怕的是被遗漏而不知。因此，关键是要去发现和善用这些人才。

唐太宗除了重用自己做秦王时的旧僚属房玄龄、杜如晦，还引用太子李建成的幕僚魏征、王珪和韦挺等人。此外，他还着意发掘新的人才。有一次，唐太宗要求大臣对朝政得失提出意见。中郎将常何提交了一份有二十多条意见的条陈表，太宗看了很欣赏，但他想到常何作为一个武将写不出这些意见的，便问是谁替他起草，当他从常何口中得知是马周代写，便立即召见这位二十九岁的青年。在等待马周前来的期间，唐太宗更四次派人催促，显示出他对求贤的殷切渴望。常何也因为“知人”而受到赐绢三百匹的奖励。但是唐太宗并没有让马周一举登天，而是先让他直门下省，后来又让他担任监察御史、中书舍人，十五年后才任命他为宰相。就这样，一批有才能、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士人及低下级官吏，被提拔到各级政府部门担任要职。



唐太宗昭陵出土的彩陶唐代武士俑

唯才是用

贞观二年，太宗对待臣说：“为政之要，唯在得人。用非其才，必难致治。今所任用，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。”这就成为唐太宗在位时期用人的基本标准，在选拔官吏时唐太宗也能够做到唯才是用，而不问亲疏，不论贵贱。对于高祖时重用的老臣，太宗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处理，有的留用，有的罢免。同时提拔了一批博通经史，又熟悉山东地区复杂情况，并富有政治军事才能，以及一些出身中下层的官吏，来担任宰相和高级官员。

魏征、王珪原本是太子李建成的属官，魏征更曾经劝太子李建成及早除掉李世民，但太宗认为这是忠于所事，不仅没有报复，并且随着对魏征等人加深了解，不断加以重用，并于贞观三年提升他做宰相。唐太宗为秦王时的旧臣对此很不满意。唐太宗回答说：“朕以天下为家，不能利于一物。唯有才行是任，岂以新旧为差。”拒绝了这些旧部下担任高官的要求，只根据他们的才学与德行，分别授予不同的官职。



唐代加彩武官俑

发挥三省作用

唐初实行三省制，作为全国最高的政务机关。三省就是尚书省、门下省和中书省。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，下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；中书省负责起草皇帝诏令；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给皇帝的请示报告和中书省起草的诏令。唐初以门下省长官侍中、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和尚书省长官左、右仆射为宰相，同时还任命一些其他职官共同参与朝政，称“参知政事”、“参议得失”等，也是宰相。宰相上午在设于门下省的政事堂议事，下午到本部门处理政务。遇有重大政事，唐太宗会召集宰相及大臣共同讨论，待群臣充分发表意见后，他再归纳总结，作出决定。军国之务和五品以上高级官员的任免，都要事先由宰相在政事堂议决，报请皇帝批准后，再按一定的程序颁行。

对于中书省起草的诏敕，太宗要求中书省和门下省官员充分发挥检察、审核的作用。太宗指出，人们的意见，或有不同，或有是非，为的都是公事。有的人护己之短，甚至造成怨隙；也有的人为了避免私怨，明明知道是错的，也不加驳正。这些都是为了个人的颜面，却给万民造成大弊端，实在是亡国之政。因此，太宗

要求大臣“灭私徇公，坚守直道”，诏敕有不合适的地方都要据理论奏，切勿上下雷同。太宗更尖锐地向中书、门下的官员指出，如果只管在诏敕上签字署名，又有谁不能做呢？又何必委派你们来担任这些职务！



唐代彩绘文臣俑

兼听纳谏

唐太宗特别注意虚心受人，兼听纳谏，凡事不自满自傲，并能虚心接受臣下的意见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唐太宗曾经问魏征：“人主何为而明？何为而暗？”魏征回答说：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”即多方听取意见才能辨明是非得失，若只听一方的意见，则容易愚昧不明。魏征并且举秦二世偏信赵高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，终至危亡的例子，说明“是故人主兼听广纳，则贵臣不得拥蔽，而下情得以上通也。”指出君主只要兼听纳谏，则不会被臣下蒙蔽，下情亦得以上达。唐太宗听后深以为然，时时注意听取臣下的意见。

太宗命五品以上的在京官员轮流在中书省内住宿，以便随时召见，向他们了解民间疾苦和政事得失。贞观三年（公元629年）还下诏令文武百官上书极言政事得失，务必要使自己耳目外通，避免为百姓所怨。贞观初太宗曾对公卿大臣说过，人欲自照，必须明镜。主欲知过，必借忠臣，要求大臣极言规谏，更鼓励大臣犯颜直谏。

贞观四年（公元630年），唐太宗要修复洛阳乾元殿，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言，要求停止这项劳民伤财的工程，认为在社会凋残之后，劳役疮痍之人，耗费亿万钱财，有甚于隋炀帝。太宗问他，你说我不如隋炀帝？那么和夏桀和商纣王相比呢？张玄素回答说，如果不停止，最后同归于乱，和桀、纣也是一样。唐太宗听后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，暂时停止了这项工程。唐太宗认为张玄素能以卑谏尊，坚持自己的意见，是很不容易的，因此赐予绢二百匹，以示奖励。事后，魏征也称赞张玄素：“张公遂有回天之力。”当然，群臣的谏言唐太宗也有受不了的时候，特别是魏征经常当着群臣反对太宗的意见，弄得太宗下不了台。

有一次，太宗罢朝后怒气冲冲地说：一定要杀掉这个田舍汉。长孙皇后问是谁？太宗说：魏征经常在朝廷上辱我。长孙皇后听说后，立刻换上朝服，站立在院子里。太宗很惊奇，忙问这是为什么？长孙皇后回答说：“妾闻主明臣直。今魏征直，由陛下之明故也。妾敢不贺？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194）唐太宗听了以后转怒为喜，很是高兴，不仅没有杀魏征，而且对魏征更加重视。

由于魏征敢于犯颜直谏，在保证致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，因此当贞观十七年（公元643年）魏征死后，唐太宗对他思念不已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太宗在魏征死后曾对待臣说：“人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见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魏征没，朕亡一镜矣！”



司空太子太师郑国公魏征画像



唐代加彩文官俑

贤臣

贞观初年，唐太宗除了重用房玄龄、杜如晦等秦王府旧人，还先后起用王珪、魏征、戴胄等大臣。中年以后，又先后重用刘洎、马周、岑文本等贤臣。

房玄龄

房玄龄在隋朝做过县尉，后被免职。唐太宗在渭北作战的时候，见到房玄龄，一见如故，便让他担任秦王府记室参军。每次战争结束，众人竞求金宝，房玄龄则忙于为李世民的幕府搜罗人才。同时结交谋臣猛将，使他们为李世民效力。唐太宗即位后，他被任命为中书令，后调任尚书左仆射。房玄龄担任宰相以后，参与典章制度的制定和政府机构的调整，并主持修定法律。同时，他也非常重视各级官员的选任，不论贵贱只根据各人的能力、才识加以任用。有一次户部尚书空缺，由于没有合适的人选，他便自己兼管户部。房玄龄尽心竭力，时刻关心政府的各项事务，唐太宗因而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左右手。



司空梁国公房玄龄画像

杜如晦

杜如晦在隋朝时做过县尉，唐初为秦王府兵曹参军。房玄龄对李世民说，杜如晦有王佐之才，如果想要经营四方，非此人不可。于是李世民奏请高祖李渊，以杜如晦为秦王府属僚。杜如晦经常跟随李世民征战，军国之事，剖断如流。唐太宗即位后，杜如晦先后任兵部尚书、检校侍中、尚书右仆射。他和房玄龄一起，悉心竭力辅佐唐太宗，唐初的政府机构及典章文物多为二人所制定。他们获得了很高的声誉，当时被称为房、杜。

传说唐太宗每与房玄龄商量大事，房玄龄在谈了自己的见解后总是说：这件事非如晦不能谋。而杜如晦来后，最后还是用房玄龄之策。房知杜能断大事，杜知房善建良谋，二人相互了解、信任，并相互配合，成为唐太宗的左膀右臂。故当时人称玄龄善谋，如晦善断。这就是成语“房谋杜断”的来历。

魏征

在贞观初年所重用的大臣中，唐太宗最看重的是魏征。《贞观政要》记载了唐太宗对魏征的几次评论。在“贞观之治”的治世景象初现之时，太宗对群臣说：“贞观初，人皆异论，云当今不可行帝道、王道，唯魏征劝我，既从其言，不过数载，遂得华夏安宁，远戎宾服。……使我遂得于此，皆魏征之力也。”太宗听从魏征之言行王道后，不到几年，海内升平，四夷宾服。

贞观十年，太宗谈到：“朕是达官子弟，少不学问，唯好戎马。至于起义，即有大功，既封为王，偏蒙宠爱，理道政术，都不留心，亦非所解。及为太子，初入东宫，思安天下，欲克己为理，唯魏征与王珪，导我以礼义，弘我以政道。我勉强从之，大觉其利益，力行不息，以至今日安宁，并是魏征等之力，所以特加礼重，每事听从，非私之也。”

贞观十二年，太宗更特别肯定了魏征在贞观时期的作用：“贞观以前，从我平定天下，周旋艰险，玄龄之功，无所与让。贞观之后，尽心于我，献纳忠谏，安国利人，成我功业为天下所称者，唯魏征而已。”



魏征画像

良将

唐太宗手下有一批杰出的将领，其中有军事理论家李靖、杰出的统帅李勣、文武兼备的侯君集、非大胜则大败的薛万彻、猛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，以及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。他们在唐初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为唐朝的稳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

李靖

李靖原名李药师，是隋朝名将韩擒虎的外甥，常与韩谈论兵法，受到韩的赞扬。李渊攻入长安后，李世民把他召入幕府。唐高祖初年，开州蛮族冉肇则率众攻打夔州，赵郡王李孝恭接战不利。李靖率兵八百攻破其营，又在险要处设下埋伏，打败冉肇则军，俘获五千多人。

武德四年，在平定江陵萧铣的战役中，李靖利用秋天江水泛涨，三峡路险，而萧铣又休兵不备的时机，进军夷陵。在打败萧铣的清江守将后进围江陵，萧铣被迫出降。

李靖还指挥了平定辅公祏的战役。贞观四年，李靖率领军队反击突厥。他以三千轻骑深入敌境，收复定襄，突厥颉利可汗退走保铁山。李靖选精骑一万，携带二十天干粮，疾速进军至阴山，直到距颉利可汗牙帐十五里的地方才为敌人所发现，李靖就这样出其不意地把突厥打败。贞观九年，吐谷浑寇边，亦为李靖所平定。



李靖画像

唐太宗

李勣

李勣原名徐世勣，隋朝末年参加李密瓦岗军。于李密被王世充打败后归唐，后跟随李世民征讨王世充、窦建德。贞观四年，与李靖相互配合，一举打败突厥。

贞观十五年，薛延陀南侵入居漠南的突厥李思摩部落，李勣率轻骑追击，在青山大破薛延陀军。贞观十八年，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攻破辽东境内数城。贞观二十年，率二百骑发突厥兵讨击薛延陀，在乌德鞬山大战胜利，大漠以北才平定下来。

尉迟敬德

尉迟敬德，隋末从军，后为刘武周部将。李世民打败宋金刚后，尉迟敬德与寻相等举介休城投降。后来在攻打王世充时，寻相和其他刘武周降将都叛变了，李世民部将都认为尉迟敬德必叛，把他囚禁在军中。有的将领还请求立即诛杀尉迟敬德，以免后患，但李世民不以为然，下令立即释放，并把尉迟敬德带到自己的住处，赐以金宝，要他不要疑虑、介意，自己必不听信谗言以害忠良。

当天尉迟敬德与李世民一起出猎，遇上王世充率领步骑数万前来进攻。王世充的骁将单雄信直向李世民冲来，尉迟敬德跃马大呼，横刺雄信坠马。在尉迟敬德的护卫下，李世民得以突出敌围。尉迟敬德又率领骑兵与王世充交战数合，大败敌兵，俘获敌兵六千人。李世民因而对他说：“何相报之速也。”

门神古已有之，但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。玄武门之变后，唐太宗以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，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，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，负责宫廷警卫。据说太宗曾说过，只有尉迟敬德宿卫，他才能安睡。后来传说就逐渐演化为太宗生病，户外鬼魂呼号，尉迟敬德与秦叔宝戎装立于门外，鬼魂不敢再来。太宗因令画二人像挂在宫门两侧。因此，后代把尉迟敬德和秦叔宝视为门神二将军。



秦叔宝画像



尉迟敬德画像

第四章：贞观之治

唐太宗即位后，与大臣一起探求治道政术，并身体力行，很快就达到了致治的局面，社会安定，恢复生产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国力日益强盛。贞观时期，朝廷上下形成了一种古代王朝少有的政治文化：皇帝兼听纳谏，广任贤良；大臣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上下齐心一致，力求致治。同时，修史编书，大办学校，也使学术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。此外，唐太宗还厉行法治，要求一切以法为准。凡此种种，缔造了历史上有名的“贞观之治”。



《唐九成宮醴泉銘》，北宋拓本

君臣论治

唐太宗经常和大臣商讨如何能迅速致治。在讨论的时候，君臣们很能针对现实问题，引经据典，并结合历史事实，一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另一方面还提出了许多很有意义的理论性问题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君臣论治。唐朝历史家吴兢把贞观君臣议论的内容，加以分类编撰成《贞观政要》一书，传于后世。

在讨论用什么方法才能迅速致治时，有的大臣认为夏、商、周以后人心愈变愈坏，只有仿效秦、汉那样用严刑酷法，才能压服人民。意思是大乱之后不能立即致治。魏征则引历史事实为证，认为大乱之后人民渴望致治，只要教而化之，采取适当措施，上下同心，是可以迅速致治的。

魏征的言论使唐太宗对国内形势有了一个清醒的认知。因此，当有人主张用重法去镇压盗贼时，唐太宗坚决拒绝了这种高压做法。他说：“民之所以为盗者，由赋役繁重，官吏贪求，饥寒切身，故不暇顾廉耻耳。朕当去奢省费，轻徭薄赋，选用廉吏，使民衣食有余，则自不为盗，安用重法邪！”指出了只有轻徭薄赋，以仁义治天下，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。经过几次的君臣辩论后，以王道治国的方针很快就被确定下来。

为君之道

贞观君臣在总结隋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时，注意到隋炀帝滥用民力，远远超出了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能力范围，致使农业生产不能正常进行，造成社会经济严重破坏，最终导致国家灭亡。唐太宗由此提出了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。若损百姓以奉其身，犹割股以啖腹，腹饱而身毙。”凡事以民为先的为君之道。

此外，太宗还从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中得到另一启示，对侍臣说：“天子者，有道则人推而为主，无道则人弃而不用，诚可畏也。”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。魏征听到后，非常高兴，回答说：“臣又闻古语曰：‘君’，舟也；‘人’，水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陛下以为可畏，诚如圣旨。”指出了民众力量的可畏。

贞观初年，有人上书说，皇帝应该独掌威权，不可将权柄移交臣下，请唐太宗实行独裁统治，但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则对唐太宗说：隋朝皇帝不信任大臣，每件事都要亲自过问，独断独行，结果是积累愈来愈多错误，怎么能不灭亡呢？

贞观四年，唐太宗对隋文帝的施政作了进一步的发挥，他认为：隋文帝不肯信任各级机关，什么事都要自己决断，虽然非常辛苦，但事情却不能尽合于理。因此

他指出：“朕意则不然。以天下之广，海内之众，千端万绪，须合变动。……岂得以一日万机，独断一人之虑也。”唐太宗在这段话里承认，皇帝是不可能遍知天下之事，皇帝每件事都自己做决定，一定会造成大量的错误。这就是承认皇帝并非万能，也是会犯错误的。

唐太宗作为一个皇帝，自己卸下皇帝万能的神秘面纱，在古代的专制王朝政治中是具有很深意义。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，凡是国家大事，唐太宗都会召集大臣一起商量，凡是重要的政务，也会让各个部门先提出意见，经过宰相的研究，再奏请执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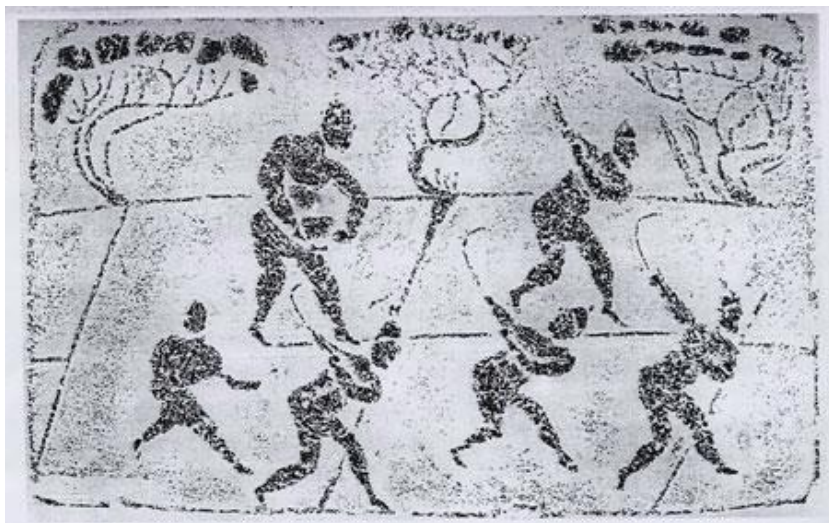
太宗还要求各个部门须负起责任，特别是中书省和门下省官员要勇于提出意见，防止错误发生。这对于保证国家政策、法令和各项决策的正确性和恰当性，具有重要意义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由是鲜有败事”。自此以后便很少发生决策错误的事。

劝农务本

隋末动乱，社会生产受到严重摧残，唐初在削平群雄的过程中，生产又进一步受到破坏，再加上贞观元年三年，关东和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水旱霜蝗之灾，百姓四处奔波谋生。贞观四年，全国丰收，流散人口都能返回乡里，但直到贞观五六年间，生产尚未全面恢复。贞观六年，唐太宗本想到泰山封禅，为魏征所谏阻，认为当时土地荒废，仓库空虚的情况还没有改变，加上从洛阳以东，直到山东沿海，仍然是“灌莽巨泽，茫茫千里，人烟断绝，鸡犬不闻，道路萧条”，时人由洛阳远行到山东，更必须随身带足干粮。因此，在这种社会萧条的景象下，实不应“崇虚名而受实害”。太宗最终接受魏征的劝谏，停止封禅计划。

除农业生产未能恢复外，国家户口也大大减少。大业元年（公元605年）前后，河南、山东、河北地区户口有470万户，到贞观中期，才有70万户，只及隋朝时的七分之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唐朝政府除了按照《户令》和《田令》，通过登记户籍来确定农村人口的土地产权外，还采取了轻徭薄赋，不夺农时、鼓励垦荒、注意救灾和增加劳动力等一系列切实措施，以促进恢复生产和发展。同时还修复了关中、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，又在关东、河东等地新修了若干水利工程。

为了保证有效推行劝农务本、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和各项措施，唐太宗非常注重任用地方官吏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他曾经说过：“为朕养民者，唯在都督、刺史”，“县令尤为亲民，不可不择。”可见太宗对任命都督、刺史等地方官员的重视。他更把都督、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，随时记录他们的善恶政绩，以备赏罚升降，严厉惩处贪污的官吏。



农耕画像砖

轻徭薄役

唐初实行租庸调制度，而当中以“庸”代役的制度，可以尽量减少人民徭役征发的负担，使人民可以专注务农，从事生产。据《旧唐书·高季辅传》记载，对于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等战乱破坏最严重的地区，在相当一个时期内，唐朝政府基本没有在这里征发徭役。虽然长安附近的关中地区，兵役、徭役较重，但在征发役民时也注意到不夺农时的原则，尽量在农闲时征发。

贞观五年（公元 631 年）二月，皇太子要行冠礼，需征发府兵来作仪仗，但唐太宗认为，当时春耕正在开始，“农时最急，不可失也”，把冠礼推到十月。即如对突厥、吐谷浑的战争，也都放在冬天农闲时才展开。直至贞观中期，太宗还能注意到不误农时。贞观十四年（公元 640 年）冬十月，太宗准备去同州打猎，栌阳县丞刘仁轨以农事收获未毕，非人君顺动之时，上表切谏。太宗因而停止游猎，并把刘仁轨提升为新安令。太宗的这些举措，不仅从制度上，而且还从具体执行上，保证农民不会因服役而造成耽误农时，或者中断农业生产的情况。



壬午年春牛图

垦荒政策

唐初，政府鼓励地少人多的狭乡农民，前往地广人稀的宽乡去开垦土地，而开垦者占有土地的数量则没有限制，并规定从狭乡迁往宽乡的人民，可以免除几年的赋税：迁到一千里以外的免三年，五百里以外免二年，三百里以外免一年。

贞观初年，旱灾、蝗灾、霜灾、水灾连年不断，关中甚至有卖儿鬻女的。唐太宗除下令减免赋税，派中书侍郎温彦博、尚书右丞魏征等分别前往各州赈恤灾民外，

唐太宗

还派御史大夫杜淹巡视关内各州，并由政府出钱，赎回被卖的儿童，使他们与父母重聚。地方官吏也着重对逃荒农民的组织 and 安排。灾年过后，农民皆可回归乡里。州县长官也会对老弱或逃亡归来但欠缺粮食的农民，加以适当救济。这样，农民还乡后马上可投入生产，保证了已垦土地不致再次荒废。

奖励人口增殖

为增加全国人口，唐太宗要求青年男女适时婚配，鼓励寡妇再嫁。贞观元年二月诏：刺史、县令以下官吏，如果能使婚姻及时，鳏寡数少，可以按照户口增多的情况，提高他们年终考核的等级。如果劝导无方，男女不能及时婚配，便要按照户口减少情况来降低他们的年终考核等级。此外，政府还赎回被突厥俘掳的男女八万口。

唐太宗在阅读《明堂针灸书》时，发现人的五脏都在背部，因而下诏自今以后不得鞭打囚犯的后部，以免造成伤残，影响日后的生产劳动。贞观三年，太宗下令诸州设医学，以助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，有利生产。这些都是唐政府为保护劳动力而做的努力。



弥勒经变：嫁娶（敦煌莫高窟壁画）

提倡学术

唐太宗除经常与大臣一起探讨治道政术外，还很注意自身学习。在全国初步平定后，他开文学馆于宫西，以房玄龄、杜如晦、虞世南等十八人兼任学士。这就是有名的秦府十八学士。十八学士大多为文士和儒生，博通经史，熟悉儒家经典，李世民每在公事之余到文学馆和他们讨论典籍，从而初步接触到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国理论和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。

唐太宗即位后，在弘文殿藏书二十余万卷，又于殿侧置弘文馆，精选东南儒生虞世南、褚亮、姚思廉、欧阳询等任学士，唐太宗经常召引他们入内殿，共同议论经史，商讨政事。《贞观政要》记载，唐太宗曾对公卿说，自己“少从戎旅，不暇读书。贞观以来，手不释卷，知风化之本，见政理之源，行之数年，天下大理，而风移俗变。”唐太宗和大臣在谈话时，经常引经据典，言必五经、诸子的名句，语必历代兴亡的事实，可见贞观君臣在学习上是很有下工夫的。

唐太宗撰写的《帝范》，更可看作是贞观君臣论治和唐太宗本人读书学习的总结。唐太宗除了组织学者编撰《群书治要》、《五经正义》，修撰《隋书》、《晋书》等六史外，对文学、艺术也很重视。他能写诗，《全唐诗》中就收录了他所写的诗歌八十八首。“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诚臣。”这千古传诵的名句，便是出自唐太宗的《赐萧瑀》一诗。



唐虞世南《孔子庙堂碑》（局部）

编书修史

唐太宗命魏征等编纂了《群书治要》，摘要地汇编了儒家经典、诸子百家和历代史书的主要内容，作为自己和皇家子弟学习的材料。为了统一南方和北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，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编订了《五经》的义疏，名为《五经正义》，作为人们学习和科举考试的标准。

唐太宗很重视历史，在和大臣讨论的时候，经常从历史史实中引申出很有意义的治国理论。大臣们也常常引用历史来说明自己的观点。为了总结前代的历史，太宗下令设立史馆，修撰了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隋书》和《晋书》等六部史书。二十四史中有六部，也就是四分之一都成书于唐太宗时期。



唐代修纂《五经正义》的孔颖达

兴国学与重科举

唐太宗很重视教育，他把天下的儒士召集到长安，让他们担任国子博士、国子助教，新建学舍一千二百余间，扩大学生的名额。书学、算学也各设博士任教。唐太宗还几次到国学（国子监）听国子祭酒、司业和博士讲论。此外，太宗也为禁军士兵设立博士，以教授经业。当时高丽、百济、新罗和吐蕃等国也有派子弟到长安国学学习，学者达到八千多人，可谓盛极一时。

隋朝确立的科举制，在唐太宗时期已步入正轨，当时称为贡举。明经、进士等每

一年都要举行考试的科目称为常科，皇帝临时诏令举行考试的称为制科。贞观时期，除了有几年因灾荒停止贡举外，差不多每年都举行常科考试。对主持贡举官员上奏的录取名单，唐太宗也认真加以审核。



位于西安的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纪念碑

提倡书法

唐太宗酷爱书法，也写得一手好字，他尤其喜欢王羲之的书法，还千方百计加以搜寻。《法书要录》记载了唐太宗派萧翼赚取《兰亭序》的故事。当时《兰亭序》为王羲之裔孙智永的弟子辩才所有，藏在屋梁上的一个暗槛内。唐太宗为了得到《兰亭序》，便派萧翼去越州嘉祥寺辩才的住处。萧翼装扮成王羲之书法的爱好者和收藏者，取得了辩才的信任，并且看到了《兰亭序》的真迹。一天，辩才外出，萧翼乘机取走了《兰亭序》。现在流传的王羲之《兰亭序》摹本，便是唐太宗令褚遂良和虞世南临摹而得以流传下来的。

唐太宗时期最有成就的书法家是欧阳询，《九成宫醴泉铭》是他的代表作。虞世南的《孔子庙堂碑》、褚遂良的《雁塔圣教序》都是当时有名的书法作品。除了书法，雕塑和绘画在贞观时期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

唐太宗



唐·阎立本（萧翼赚兰亭图）



东晋·王羲之（兰亭序）。此为宋本摹本

以法为准

唐太宗即位不久，就下诏纠正违反法律行事的行为，要求各级官吏研究律令，按律令办事。太宗要求君臣须遵守法令，一切以法为准，而不以帝王的一时喜怒和片言只字为标准。他曾说：“法者，非朕一人之法，乃天下之法。”对自己临朝决断有不合于律令的，也要求大臣不要以为事小，就不提出来。他并且指出，凡大事皆起于小事，小事不提出来，发展为大事时那就不可挽救了。国家之灭亡，没有不是由此引起的。太宗把坚守法令，提升到足以影响国家兴亡的高度。

在执法上，唐太宗也不偏袒旧部属。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解职，他向太宗陈述自己曾做过秦府幕僚，想请求宽恕。唐太宗曾想让他官复原职，但魏征向他指出，在秦府工作过的人很多，如果人人都这样，那就会使正直的人害怕。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，对庞相寿说：“我前为秦王，乃一府之主；今居大位，乃四海之主，不得独私故人。”



《唐律》残片

第五章：天可汗的功业

唐太宗一直把“华夏安宁”、“远夷率服”作为致治的两个主要标志。在民族关系方面，他接受大臣们的意见，有步骤地解决边疆问题，并且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。太宗先后降服了东突厥，平定了吐谷浑，经营西域，通婚吐蕃，打败长期寇边的薛延陀，为发展和巩固中国成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作出了贡献。



唐代礼宾图，左起三人为唐代迎送宾客的鸿胪寺官员；第四人为东罗马帝国使节；第五人为高丽或日本使节；第六人为中国少数民族使节

降服东突厥

隋文帝杨坚以重兵打败突厥，促使突厥分裂为东、西两部。东突厥臣附于隋。隋末唐初，东突厥强大，割据北方的群雄都与突厥有所联系。李渊在太原起兵，也曾向突厥称臣。唐朝建立后，特别是在唐削平了山西北部的刘武周以后，突厥经常南下骚扰，掠夺人口，破坏生产，并威胁到唐首都长安的安全。

武德九年（公元 626 年）八月，唐太宗刚即位，突厥颉利可汗以为唐太宗兄弟争位，政局不稳，有机可乘，故领兵十余万南下，一直进到渭水便桥北岸，距长安只有四十里的地方。唐太宗看到突厥人马虽众，但部队散漫，估计此来是想乘机勒索，又考虑到自己刚刚即位，国家未安，百姓未富，如果战争，会造成巨大损失，决定和平解决。于是，太宗接受李靖的建议，亲率大军到渭水与突厥对阵，又派李靖带兵埋伏在突厥军的背后，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。然后，太宗轻骑独出，单独与颉利可汗会谈，并承诺赠颉利可汗大量金帛。颉利可汗看到唐朝政局稳定，

又得到唐所给的大量金帛，便与唐订盟约和而退兵。

突厥退走后，太宗致力恢复生产，同时密切注视草原形势的发展，并加紧训练军队。贞观三年（公元 629 年）唐太宗看到突厥败乱，反击的时机成熟，便于十一月，派李靖、李勣率领军队分道出击突厥。次年二月，打败突厥，俘掳了颉利可汗。唐打败东突厥以后，西北各族的君长奉唐太宗为“天可汗”。这样，唐就取代了突厥对西北各族的统治，唐太宗也以“天可汗”而成为西北各族的最高君长。

突厥被打败后，许多突厥人南下居住，唐太宗把他们安置在东自幽州（今北京市），西至灵州（今宁夏灵武南）的广大土地上。还有许多突厥酋长到朝廷担任将军，中郎将。当时，到长安居住的突厥人近万家，担任五品以上官员的有一百多人。



突厥人墓前石雕

经略四方

唐打败东突厥以后，伊吾（今新疆哈密）归唐，高昌（今新疆吐鲁番）王入朝，中西交通的通道初步开通，丝绸之路的交通重新恢复。贞观八年（公元 634 年）吐谷浑进攻凉州（今甘肃武威），威胁河西走廊，影响丝路交通，唐太宗派兵打败吐谷浑。贞观十四年（公元 640 年），高昌王与西突厥联兵攻打伊吾和焉耆（今新疆焉耆），阻绝西域与中原的交通。唐太宗命侯君集率兵击平高昌，以高昌为西州，可汗浮图城为庭州（今吉木萨尔北），并设立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（今新疆吐鲁番以西）。当时西域各国一方面向西突厥称臣，同时也向唐朝贡。

唐以突厥贵族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，于贞观二十二年（公元 648 年）攻破龟兹（今新疆库车）。唐把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到龟兹，下统焉耆、疏勒、于阗（今新疆焉耆、喀什、和田）和龟兹四镇，历史上称之为安西四镇。唐太宗还任命原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。此时，唐对西域的影响已大大加强。



交河故城遗址，位于新疆吐鲁番以西雅尔湖乡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

通婚吐蕃

七世纪初，吐蕃统一了青藏高原。公元 640 年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大相禄东赞献金为聘礼，再次向唐请婚。唐太宗答应把宗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。唐朝画家阎立本创作的名画《步辇图》，便记录了这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场面。第

唐太宗

二年正月，唐太宗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，松赞干布亲至柏海（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）迎接。从此，吐蕃赞普和唐的皇帝以甥舅相称，两国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关系。经济、文化上的交流，也不断得到发展。吐蕃的贵族子弟被派到长安国子学学习。唐代许多酿酒、制造碾磑、造纸、制墨和制笔的工匠，也被派到吐蕃传授技艺，而中原地区的蚕种和养蚕的技术也传到吐蕃。



《步辇图》记录了唐太宗接见吐蕃请婚使节禄东赞的场面。图中端坐者为唐太宗



西藏大昭寺内的文成公主入藏壁画

东征高丽

唐朝初年，高丽统治着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地区。贞观十七年（公元 643 年），高丽与百济联合攻打唐的友好国家新罗，新罗请唐救援。唐太宗便以此为借口，下令攻打辽东。贞观十九年（公元 645 年），李勣率军从陆路，张亮率舟师从水路，分两路进攻高丽，唐太宗亲自到辽东前线督战。唐军攻下辽东城后，接着攻打安市城（今辽宁海城），自六月二日至九月十八，历时三月没有攻下。这时，天寒水冻，粮食将尽，唐太宗只好班师回朝。

贞观二十一至二十二年（公元 647 至 648 年），唐军同时在西域和东北，对突厥、高丽作战，又征发江南、剑南二道民工造船，兵役、徭役空前繁重，有的地方人民因而起来反抗。但从当时的全国形势来看，人民的反抗还只是一种暂时及局部的现象。当停止战争，减轻征发后，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。



李勣墓出土的“三梁进德冠”

府兵制

唐朝实行府兵制，这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度。府兵也称为卫士，由地方政府选取家境较好，身强力壮的成年男子担任。卫士由所在地的折冲府统领，他们平常在家中劳动，农闲时由折冲府组织训练，并轮流到京城执行警卫任务。遇有战争要应征出征。

战争时除了征发府兵，还要招募普通的老百姓当兵。唐朝政府设置了勋官，授与作战有功人员。对于作战有功的将士，还给予丰厚的赏赐，有的并且可以授予官职。薛仁贵就是因为作战英勇，由白丁一跃而被任命为从五品的游击将军。这些办法对于吸引老百姓从军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起了有力的作用。这也是唐太宗对外战争的强大后盾。



唐代彩绘甲马武士俑

第六章：治世风貌

唐太宗贞观年间，国内形势安定，社会经济逐渐由恢复阶段走向发展阶段，农村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。当时，国势强盛，唐政府与周边民族有着良好的关系。同时，中外交流频繁，文化繁荣，在文化艺术上有许多新的创造。因此，贞观时期历来被称颂为中国古代的一个理想治世。



《商旅图》壁画，描绘了盛唐之世贸易流通的景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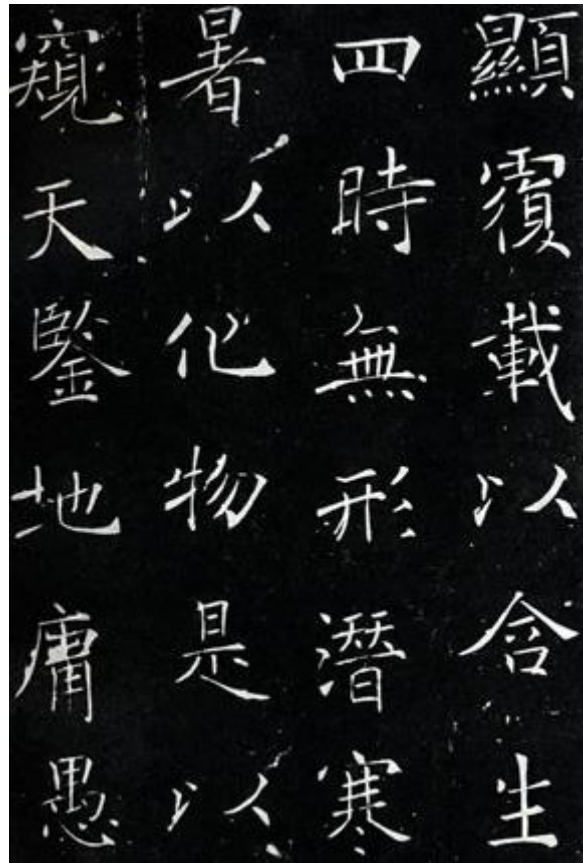
繁盛的中外交流

唐太宗贞观年间，和周边国家往来密切。唐的使臣去过不少国家，而新罗、高丽、百济、吐火罗、康国、安国、石国、波斯、林邑等国也先后派遣使臣来唐。贞观二十二年，新罗女王金真德派其弟国相金春秋等来唐。金春秋到国学听讲并观释奠之礼。唐太宗赐给他新撰成的《晋书》以及太宗自己所作的《温汤》和《晋祠碑》。日本圣德太子派到中国的留学生高向玄里、南渊请安和学问僧旻，在中国学习了二三十年后，于贞观中期返回日本，带回了有关唐初在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最新成就，成为日本大化革新的重要推行人物。

玄奘西行取经

玄奘西行取经是贞观年间，中外交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。玄奘经中国新疆、中亚地区和阿富汗，到达巴基斯坦和印度。在今巴基斯坦、尼泊尔和印度留学。玄奘在那里会见了戒日王，除了向他讲述唐朝的情况，还介绍秦王破阵乐。贞观十九年，玄奘回国后，在长安组织专门机构翻译佛经，并应唐太宗的要求，口述西行的见闻，再由弟子写成《大唐西域记》。玄奘回国后不久，戒日王的使臣来到长安，太宗因而派使臣回访。此外，唐太宗还派遣王玄策两次出使印度，第二次并带去玄奘翻译成梵文的《道德经》。王玄策还顺道访问了尼波罗（今尼泊尔）。

唐太宗



唐·褚遂良《雁塔三藏圣教序》碑刻（局部），现藏于西安大雁塔



大雁塔，本名慈恩寺塔，是一座典型的楼阁式塔，当时此塔存放着唐代高僧玄奘从印度取回的梵文佛经

开放的社会文化

五胡十六国以来的民族大融合，决定了唐代文化的胡汉混合特性，而南北朝以来中外交往频繁，给唐代文化注入了外来因素。这样，使得唐代的社会文化生活更多元，更开放，更绚丽多采。

十部乐

隋炀帝在张掖燕支山下，曾以九部乐招待二十七国君长。唐高祖去“礼毕”，加燕乐，改清乐为清商乐，亦为九部乐。后来唐太宗加高昌乐成为十部乐。其中包括龟兹乐、疏勒乐、高昌乐、西凉乐等少数民族音乐，以及康国乐、安国乐、高丽乐、天竺乐等外国的音乐。

马球

马球又称击鞠、打毬，以往学者大多认为是从波斯传入，最近有学者经过研究，认为是藏族人民创造。马球在唐初已传入中原，唐太宗曾在安福门观看西蕃人打毬。

服装

在服饰上，唐人在传统服装的基础上，吸收各民族和外国服饰的特点，形成了唐代服装的独特风格。有些过去的胡服成为唐初的时装。小袖袍、裤和靴是当时最流行的服装，领式有圆领、翻折领、对襟开领等样式。少女所穿半臂长衣，或袒露颈部的短襦长裙，配以搭在双肩的披帛，走起路来给人飘然若仙的感觉。在日常穿着上，汉人穿戴胡人的衣帽，胡人穿戴汉人衣帽，成为一种很常见的现象。



簪花仕女图卷

物阜民丰

虽然贞观初年的全国经济残破，但当时存在大量荒地，农民都能拥有土地，唐政府通过田令和户籍登记确定了农民的产权。同时，唐太宗又实行劝农务本的具体措施，这就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，社会经济因此很快得到恢复。

贞观四年开始，全国连续几年丰收，粮价下跌，从一匹绢换一斗粟，下跌到一匹绢得粟十余石。社会秩序迅速回复安定。《贞观政要》卷一〈论政体〉描述当时的情况是：“商旅野次，无复盗贼，囹圄（监狱）常空，马牛布野，外户不闭。又频致丰稔，米斗三四钱。”

中原和山东农村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，行旅不必自带干粮，沿途可以得到供应。旅客进入山东后，会得到优厚的供给与接待，有的在离开时还受到馈赠。可见，社会开始出现了小康的局面，而这是广大人民经过十几年艰苦劳动，战胜生产资源的缺乏，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等重重困难，才取得伟大的成就。但是，从全国整体的情况来看，贞观时期的经济远远没有达到隋代的水平。河北地区还是处在恢复的阶段。全国人口，直到高宗永徽三年（公元 652 年）也才增加到 380 万户，比起隋代的 900 万户，还差得很远。



唐高祖废隋五珠钱，改铸开元通宝钱

外来的宗教信仰

唐太宗对宗教采取尊重的态度，除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，从天竺传来的佛教外，在贞观时期还有祆教和景教。

祆教

祆教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传入中国。祆教又称火祆教或拜火教，流行于波斯和中亚各国，以火代表善神而加以崇拜。贞观五年（公元 631 年），长安重建了祆寺，在凉州（今甘肃武威）等地的波斯、粟特商人建立了祆祠。唐朝还继承北齐和隋的制度，设立萨宝负责祭祀祆神和管理祆教徒。

景教

景教是基督教的别支，是敍利亚人聂斯托利所创。唐太宗贞观九年（公元 635 年），景教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来到长安。贞观十二年，唐太宗下令在长安设波斯寺一所，普度僧人二十一人（“僧人”一词在古时不限于佛教或道教，也可用于其他宗教），寺院墙壁上绘有唐太宗的画像。从此，景教开始在中国流行。



碑文记述了景教教规、教义及其在唐代的传播情况。当中“大秦”二字为古代中国对东罗马的称呼

第七章：功过评价

唐太宗在经济凋敝，社会动荡，边境不安的情况下，通过调整政策，采取具体措施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，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出现了“贞观之治”的局面。他还巩固了国家与各民族的关系，与亚洲各国发展交往。唐太宗创建了丰功伟业，其政治理论和个人形象在死后亦影响后世。这样的君王，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。



《资治通鉴》书影

历史贡献

唐太宗曾说过：“朕年十八，便为经纶王业，北翦刘武周，西平薛举，东擒窦建德、王世充，二十四而天下定，二十九而居大位，四夷降伏，海内义安，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，无见及者，颇有自矜之意。此吾之过也。”可见太宗对自己的武功治绩，曾经有过骄傲自满的心态。

其实，太宗所说的削平群雄，大定天下，自然是他的伟大功绩，但这只是一个统帅的业绩，其他的将帅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，而安定国内形势，恢复发展生产，巩固并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发展与其他国家的交往，繁荣学术和文化，这才是唐太宗作为一个皇帝的主要功业。在太宗与大臣论治过程中，所形成的政治思想和君臣一体的政治局面，更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，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历代政治家多把唐太宗作为效法的楷模，把贞观之治作为追求的政治目标。

晚年得失

到贞观中晚年，唐太宗自认为在武功、文治和怀远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古人，骄

傲自满的情绪因而大大地滋长，不再鼓励臣下对自己提出意见，臣下提出意见后，接受时多少也有些勉强，而在个人享受的贪欲方面也与日俱增。唐太宗自己承认，“吾居位以来，不善多矣，锦绣珠玉不绝于前，宫室台榭屡有兴作，犬马鹰隼无远不致，行游四方、供顿烦劳，此皆吾之深过。”但是总的说来，在贪欲和享乐方面，太宗还能注意到不超出人民所能负担的限度。



唐太宗昭陵全景

历史评价

历史上对唐太宗的评价，从唐代的吴兢，北宋的欧阳修、司马光到元代的戈直，乃至明朝的明宪宗，都给予极高的评价。

唐朝吴兢在《贞观政要·序》中说：“太宗时政化，良足可观，振古而来，未之有也。”

北宋的欧阳修在《新唐书·太宗本纪》赞曰：“自古功德兼隆，由汉以来，未之有也。”

元朝《贞观政要》集论的撰者戈直说：“夫太宗之于正心修身之道，齐家明伦之方，诚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矣。然其屈己而纳谏，任贤而使能，恭俭而节用，宽厚而爱民，亦三代而下，绝无而仅有者也。后之人君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，岂不交有所益乎！”这里所说，太宗在正心修身，齐家明伦方面，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，主要是指太宗与其兄李建成的皇位之争。

明朝宪宗在命儒臣订正重刊《贞观政要》时写道：“太宗在唐为一代英明之君，其济世康民，伟有成烈，卓乎不可及已。所可惜者，正心修身，有愧于二帝三王之道，而治未纯也。”



元代刻本《资治通鉴》

参考资料

1. 后周·刘昫等撰：《旧唐书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7年）
2. 宋·司马光等撰编、胡三省注：《资治通鉴》卷180至卷199（海口：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，1995年）
3. 宋·袁枢撰：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7年）
4. 唐·吴兢撰：《贞观政要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）
5. 唐·温大雅撰：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）
6. 汪篻：《汪篻隋唐史论稿》（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1年）
7. 袁英光、王界云：《唐太宗传》（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）
8. 胡如雷：《李世民传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年）
9. 赵克尧、许道勋：《唐太宗传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）
10. 黄永年：《唐太宗李世民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）
11. 吴宗国主编：《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·隋唐卷》（南宁：广西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）
12. 吴宗国：《隋唐五代简史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）

鸣谢

图片提供：上海书画出版社、文物出版社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、中华书局、北京故宫博物院、宜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、学林出版社、罗振纲。